

# 民族主义视野下的两伊关系变迁

田志馥<sup>1</sup> 谢立忱<sup>2</sup> 李 慧<sup>2</sup>

(1. 福建师范大学 社会历史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2. 山西师范大学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山西 临汾 041004)

**摘 要:** 自1921年伊拉克诞生至今,伊拉克和伊朗的双边关系大体经历了从对抗到回摆的历史变迁。如果从两伊占主流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视角来考察,不难发现,两伊关系的演变可分为五个不同的历史时期:1921年伊拉克获得半独立之后的两伊关系;1958年伊拉克革命之后的两伊关系;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的两伊关系;1990年海湾危机后的两伊关系;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的两伊关系。研究表明,在可预见的将来,民族国家是国际主要行为体,民族主义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两伊应在更趋理性的民族主义因素影响下深化双边关系。

**关键词:** 伊朗; 伊拉克; 双边关系; 民族主义

**中图分类号:** C95; K3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3842(2012)03-0058-05

伊拉克和伊朗是中东地区的两个区域性大国,都位于亚洲的西南部,伊朗在东,伊拉克在西,两国濒临海湾(波斯湾)。从1921年伊拉克半独立至今,围绕这两个国家先后发生过一系列冲突,如: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1980-1988年的两伊战争,1990年的海湾危机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等。在这一系列的冲突中,民族主义因素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本文从民族主义视角分析两伊关系的历史变迁,并对两伊关系进行展望。

## 一、民族主义的对抗

1921年伊拉克获得半独立,成立费萨尔王国。但当时统治波斯的巴列维王朝直到1929年才正式承认伊拉克。加之,伊拉克继承了原奥斯曼帝国与波斯帝国签订的有关两国边界的条约和协定,波斯对此极有怨言并力图改变这种状况。可以说自伊拉克诞生之日始,两国关系就笼罩着不和睦的阴影,这一定程度上来自于民族主义的对抗,即伊拉克民族主义与伊朗民族主义的对立。

作为获得不同程度上独立的主权国家,两伊

的当务之急就是完成民族构建任务。因此两伊都大力颂扬民族文化,利用民族主义动员民众。从伊朗方面来讲,伊朗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礼萨王(1925-1941年在位)的登基,标志着伊朗民族主义开始成为伊朗社会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伊朗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强调伊朗的民族特性和历史性,对古波斯文化的大肆宣扬和对伊斯兰文化的过分贬抑。礼萨王很注意发扬波斯传统文化来促进民族主义。他取消了波斯文外的外来字母特别是阿拉伯字母,旨在重建波斯民族主义精神文化。同时,限制伊斯兰教士的各种特权,尽力削弱伊斯兰——阿拉伯文化在伊朗社会的影响,使伊朗人民铭记阿拉伯人征服伊朗的历史屈辱。继任的巴列维政府通过强调前伊斯兰时代古波斯文化和波斯帝国的辉煌来突显伊朗人与阿拉伯人间的区别。面对此种情形,伊拉克也进行了相应的进程。政府大力宣传叙利亚民族主义者萨提·胡斯里的阿拉伯主义思想:强调阿拉伯民族的一致性,认为波斯是阿拉伯民族最大的敌

收稿日期:2012-03-10

作者简介:田志馥(1979-),男,内蒙古商都人,助理研究员,博士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中东国家边界与领土争端研究”(10CSS010)的系列成果之一。

人等。两伊为利用民族主义思想来动员民众、强化民众的民族认同感而进行的这种恶意诋毁与攻击的对抗性意识,即便没有构成当前矛盾的决定性因素,也会成为日后冲突的潜在因素。

两伊民族主义之间的对抗源于两个民族的历史恩怨和教派冲突。历史在民族认同的建构或解构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为了增强种族的凝聚力和人民的自尊感,统治者通常会更加注重强调共同的祖先及经历来夸大某些历史事件的重要性以使其具有神话色彩”<sup>[1] (P171)</sup>。对于任何国家的民族构建来讲,历史记忆、神话以及民族象征符号在促进民族意识形成方面的功能都是至关重要的。历史记忆本身是构成民族认同的核心要素。事实上,可以这样认为:“没有记忆就没有认同,没有认同也就没有民族。”<sup>[2] (P201)</sup> 公元前6世纪建立的波斯帝国横跨亚欧非三大洲,基本将整个“肥沃新月地区”置于其统治之下。然而历史却跟波斯人开了一个玩笑。公元7世纪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之后,阿拉伯人东征西伐,建立了包括今伊朗、中亚等在内的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阿拉伯帝国。阿拉伯人征服了波斯。637年的卡迪西亚战役使阿拉伯人彻底摧毁了萨珊王朝。“波斯人一直把这次失败看作是永远不能忘怀的巨大灾难”<sup>[3] (P135)</sup>,是波斯人不能承受之痛。

两伊都信仰伊斯兰教,却存在着尖锐的教派之争。伊朗奉什叶派为国教,伊拉克奉逊尼派为国教。当阿拉伯人征服波斯后,波斯人作为被征服者,在感情上和心理上更倾向与占统治地位的逊尼派相对立的什叶派,与阿拉伯的主流意识对抗。加之,在伊拉克,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处境迥然不同,为了改变自身的不利处境,什叶派经常以起义的方式对抗逊尼派掌握的国家政权。“伊拉克的逊尼派政府曾造成伊朗和伊拉克以及整个地区的紧张状况。”<sup>[4] (P81)</sup> 事实上,什叶派和逊尼派已分别成为波斯文化、伊朗国家政治和阿拉伯文化、阿拉伯国家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两伊民族主义的核心内容,对两伊的内外政策具有重大影响,一定程度上规范着两伊关系走向。

正是在这种对抗性的民族主义思想的支配或影响下,两伊之间的领土纠纷即阿拉伯河边界问题伴随着两国的独立而渐渐浮出水面。阿拉伯河的边界问题在历史上曾是奥斯曼帝国与波斯冲突的一个焦点,它们为争夺阿拉伯河进行了上百年的竞争,最终以1847年5月31日签订的《埃尔祖

鲁姆协定》作为最终解决方案。一战结束后,奥斯曼帝国成为“碎片化”国家,伊拉克继承了阿拉伯河的主权,但是伊朗宣布奥斯曼时期的条约无效。<sup>[5] (P148)</sup> 除了历史遗留问题外,阿拉伯河对两伊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经济意义。伊拉克重要港口巴士拉距阿拉伯河河口约120公里,并且伊拉克主要的原油输出管线也紧贴该河铺设,河口附近的法奥是伊拉克主要产油区,阿拉伯河还是伊拉克唯一的出海口。阿拉伯河对波斯也具有重要的地位。河畔的霍尔拉姆沙赫尔是波斯重要的出海口,也是横贯波斯铁路系统的起点站,从该地转由铁路运往内地,比在南部的其它港口转运更经济,并且“伊朗(1935年波斯正式改名为伊朗)在阿拉伯河建立了最重要的炼油厂”<sup>[6] (P59)</sup>。所以,阿拉伯河边界问题不可避免地成为两伊领土纠纷的导火索,导致了1932年的边界危机。

20世纪30年代以后,伊拉克民族主义逐渐显现出泛阿拉伯主义色彩。1942年12月,伊拉克向英国中东事务国务大臣呈送了一份备忘录,声称将黎巴嫩、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外约旦组成一个联邦国家,即“大叙利亚”,“大叙利亚”和伊拉克共同组成联合国家“阿拉伯国家联盟”,这就是著名的“肥沃的新月”计划。外约旦也提出了自己的统一阿拉伯计划,即“大叙利亚”计划。无论是伊拉克的“肥沃的新月”计划,还是外约旦的“大叙利亚”方案,都体现了浓厚的泛阿拉伯主义色彩。尽管这两个计划均告破产,但在英国的撮合下,尤其是犹太复国主义威胁不断上升的情况下,1945年3月22日,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国家联盟(简称阿盟)正式宣告成立。阿盟成立强化了阿拉伯人的民族认同感,也使伊朗的地区政治环境变得更加不利。两伊关系更是蒙上一层阴影。

## 二、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君主制民族主义的对抗

1958年伊拉克爆发以卡塞姆为首的自由军官发动的军事政变,推翻了伊拉克的费萨尔王朝,建立伊拉克共和国,实行共和制,大力推行阿拉伯民族主义。而此时的伊朗正处于巴列维王朝君主专制统治时期。伊拉克君主制的崩溃威胁到伊朗的君主制,为阻止本国有可能发生类似于伊拉克革命,伊朗全力实行君主制民族主义。所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两伊关系集中体现为阿拉伯民族主义与君主制民族主义的冲突,具体表现在领土问题和库尔德问题两个方面。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阿拉伯河边界问题和胡

齐斯坦问题在伊拉克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朗君主制民族主义的影响下变得更加突出。1958年10月,伊朗照会伊拉克政府,要求伊拉克在11月6日前任命勘界特别委员会的代表,双方共同确定阿拉伯河的边界,伊拉克则迟迟不予回应。到60年代,由于伊朗在国家整体实力上占有优势,从而单方面废除了1937年的《德黑兰条约》。围绕阿拉伯河边界问题,两国的冲突愈来愈激烈。伊拉克复兴党坚信自己肩负着拯救阿拉伯民族的责任,主张阿拉伯民族的统一,同时要求解放他们认为应该属于阿拉伯人的领土,包括对伊朗利益攸关的伊朗胡齐斯坦省。伊拉克等阿拉伯国家一直坚持胡齐斯坦是阿拉伯世界的一部分,积极支持当地阿拉伯人反对伊朗政府的斗争。但伊朗坚称该省是其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库尔德问题是两伊阿拉伯民族主义与君主制民族主义冲突下的又一凸显问题。伊拉克库尔德人的自治斗争一直是伊拉克国内不稳定的因素之一。伊朗支持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人运动,将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看作是伊拉克易受攻击的弱点,并向库尔德人提供武器,以此打击伊拉克,使其受困于内部冲突,减少乃至消除伊拉克阿拉伯民族主义对伊朗的威胁。伊朗一方面支持库尔德,一方面在两伊边界加剧冲突。伊拉克为避免两方同时作战,1975年与伊朗签订了《阿尔及尔协议》,规定两国边界在阿拉伯河主航道中心线划分,伊朗应在其西北划出一块空地作为对伊拉克的补偿,并停止对伊拉克反政府力量库尔德人的支持。总体来讲,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民族主义因素影响下,双方在领土问题和库尔德问题上互不妥协,导致两国关系日益紧张恶化。

### 三、泛阿拉伯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冲突

伊朗伊斯兰革命后霍梅尼接管政权,宣布建立伊斯兰共和国。新政权大大淡化对波斯民族主义的强调,开始倡导泛伊斯兰主义思想,认为“穆斯林民族联合的范围是整个伊斯兰世界,而不仅仅是阿拉伯世界”<sup>[7]</sup>,因此主张建立哈里发统治下的伊斯兰国家,主张维护伊斯兰的传统价值。

在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前,两伊矛盾很大程度上被限制在政府层面。巴列维对民族主义文化政策的偏重和伊朗对本民族利益的强调加深了两伊本已存在的语言和种族障碍。在这种情形下,伊朗要对阿拉伯民众产生影响,即便不是不可能的,但也是极其困难的。而霍梅尼强调伊斯兰主义则

使情况为之改变。霍梅尼首先把什叶派教徒居多数的近邻伊拉克作为输出革命的首要对象,并且支持伊拉克宗教反对派的反政府活动,谴责伊拉克复兴党政府是反伊斯兰的非法政府,号召伊拉克什叶派起来推翻这个不合法政府。伊拉克成为受伊斯兰革命冲击最大的国家。1978-1980年,得到伊朗支持的伊拉克什叶派组织“达瓦党”发动数百次反政府活动,并暗杀政府副总理塔里克·阿齐兹。此时伊拉克执政的是以萨达姆为代表的阿拉伯复兴党。萨达姆是坚定的泛阿拉伯主义者,主张民族利益高于国家利益,认为阿拉伯世界存在着“各国自身利益和阿拉伯利益两个范畴”,而“民族责任高于一切个人或地区的利益”<sup>[8]</sup>。

在此背景下,伊拉克的泛阿拉伯主义与伊朗的泛伊斯兰主义的分歧更加严重,主要表现在:(1)前者以民族为纽带,后者以宗教为枢纽;(2)前者的团结对象是同族的穆斯林,对同教不同族的穆斯林有强大的排斥,后者的团结对象是同教的穆斯林,而无论其是否同族。阿拉伯人是中东最大民族,既是前者团结的对象,又是后者最重要的争取对象;(3)前者主张以语言、地域、民族文化为基础的民族认同来挑战后者的超国家、超民族、超地域的伊斯兰教共同信仰为基础的乌玛(社团)认同。前者以民族国家为主的国家主权认同来挑战以“认主独一”为基本理念的真主主权认同;(4)在政治实践中,前者以世俗化为特征的政治、经济、文化理念来挑战后者的伊斯兰化。伊拉克复兴党认为尽管伊斯兰教是阿拉伯伟大的遗产,但却坚持泛阿拉伯主义是阿拉伯复兴的推动力量,伊斯兰教只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一小部分。换言之,伊拉克复兴党反对宗教政治化,认为它是一种分裂和动摇阿拉伯社会的因素。相反,伊朗则指责阿拉伯民族主义是前伊斯兰的遗风,“与伊斯兰教和伊斯兰原则是相悖的,他们的意图是要破坏伊斯兰教和伊斯兰哲学”<sup>[9] (P216-217)</sup>。

实际上,伊斯兰革命后的两伊冲突是一种“一方一心要领导阿拉伯世界的政策和一方一心要领导包括阿拉伯世界在内的穆斯林世界的政策间的冲突”<sup>[3] (P15)</sup>。在泛阿拉伯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冲突的影响下,1979年双方互相驱逐对方侨民,伊朗重新向伊拉克的库尔德人提供军事援助,向其开放边界。伊拉克则为伊朗的反对派提供政治避难所。两伊矛盾逐渐升级,终于导致持续八年之久的两伊战争。

#### 四、扩张型民族主义受挫和泛伊斯兰主义缓和

两伊战争使“两国(伊拉克和伊朗)的石油工业都承受了严重的损失”<sup>[10]</sup>。但伊拉克并未反思这种扩张型民族主义的外交思想,而是在1990年8月2日出兵科威特,引发海湾战争。伊拉克为避免在东西方同时遭到打击,主动改善与伊朗的关系,在最为关键的阿拉伯河归属问题及撤军问题上作了让步。与此同时,伊朗的霍梅尼于1989年6月去世,较为温和的哈梅内伊和拉夫桑贾尼相继上台,为适应国际社会,打破国际孤立的困境,哈梅内伊-拉夫桑贾尼政府开始调整以往过于激进的外交政策,放低输出伊斯兰革命的外交基调,奉行广交朋友的温和外交路线。拉夫桑贾尼务实派的执政,基本上宣告了伊朗外交狂热阶段的结束。西方学者称之为“从伊斯兰极权主义过渡到实用伊斯兰主义”<sup>[11]</sup>。作为这种政策调整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缓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对于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行径,伊朗保持低调谴责姿态。

1990年8月15日,伊拉克接受两伊和平条约,并再次承认它曾经撕毁过的《阿尔及尔协议》。1990年9月伊拉克基本释放了全部伊朗战俘,把位于伊拉克境内的一个伊朗持不同政见者组织驱逐出境。10月,两伊重建了1987年中断的外交关系。1997年8月4日,更为温和、务实的哈塔米在议会宣誓就职总统的仪式上指出,伊朗将同其他国家进行“文明间的对话”。哈塔米提出的不同文明之间应进行对话而不是冲突的“文明对话论”开始成为伊朗推行全方位的和平、缓和、对话外交的指导思想,从而为两伊关系的进一步改善提供了条件。1998年7月,首批760名伊朗公民赴伊拉克什叶派圣地朝觐。与此同时,两伊双方交换战俘、寻找阵亡士兵遗骸的工作也取得很大进展。此时伊朗口号变成了“穆斯林世界既要东方,也要西方,更要穆斯林”<sup>[12] (P38)</sup>。

总之,这一时期伊拉克的扩张型民族主义因两伊战争和海湾战争的失败而受到打击,伊朗的泛伊斯兰主义则由于霍梅尼去世也抛弃了激进的思想,温和派领袖开始上台执政,两者出现了包容之势,两伊关系趋于缓和,呈现出相互依存的态势。

#### 五、民族主义的回摆

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美国企图以伊拉克为跳板使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发生变化,特别是对伊朗的政教合一的神权政体进行改造,通过这场

“示范性”战争的影响和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压力对伊朗进行威慑。尽管伊朗指责萨达姆政府是一个残暴政权,应该推翻和受到惩罚。但自战争开始,伊朗就坚决反对联军的入侵和今后的占领。<sup>[13] (P48)</sup> 伊朗并不乐见伊拉克出现亲美政府,明确反对美国对伊拉克的动武。伊朗前总统拉夫桑贾尼公开表示说:“我们在战争(伊拉克)中保持中立,但美国如果想统治伊拉克,我们将不再保持中立”,“所有穆斯林必须帮助伊拉克人阻止美国把伊拉克变成向邻国发动袭击的基地”<sup>[14]</sup>。面对共同的敌人,伊朗进一步淡化泛伊斯兰主义,转而更多的以国家利益为中心来调整其外交政策。伊朗明确表示“它不会致力于输出伊斯兰革命,也不会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来决定其地区的外交政策”<sup>[15] (P557)</sup>。

在宗教和种族方面,伊朗抛弃了与伊拉克逊尼派为敌的思想,主张要维持伊拉克内部的宗派平衡,适当限制逊尼派权利,对什叶派则是理想主义加实用主义的方针。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在伊拉克建立了以什叶派为主的伊拉克临时政府。什叶派同伊朗在历史上就有密切的联系,许多伊拉克过渡政府的高官在上世纪80年代都曾在伊朗长期流亡。同源宗教信仰使两国产生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亲切的兄弟之情。

两伊民族主义趋向理性与务实,还在于两国共同的经济利益——石油。共同的经济利益使两国更多的强调本国的国家利益。伊拉克战争后,两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外界的经济制裁,石油工业损失最严重。伊朗国内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国内经济结构单一,失业率持续增长。伊拉克与伊朗命运趋同,并且更为严重。长期的经济制裁和多次军事打击造成的破坏,致使伊拉克严重依靠石油出口的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两国的经济重建任务亟待进行,此时的民族主义日趋务实、理性化,其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愈益体现为经济建设。

总之,伊拉克战争后,在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下,两伊的民族主义日趋理性与务实,开始注重将民族主义导向本国的建设,而不是对外扩张或输出革命。两国交往日益增多。两伊关系由原来海湾战争后的局部性缓和走向了全面缓和。2005年7月伊拉克总理易卜拉欣·贾法里率庞大的代表团访问伊朗。同年11月伊拉克总统塔拉巴尼访问伊朗,成为近40年来首位访问伊朗的伊拉克国家元首。2006年之后,两伊关系持续升温。伊

拉克总理马利基于2006年9月和2007年8月先后两次访问伊朗。2007年11月伊拉克总统塔拉巴尼时隔一年之后再度访问伊朗,寻求扩大双方在各领域的合作。2010年1月伊朗外交部长穆塔基对伊拉克进行访问,与伊拉克讨论安全合作与边境问题。2010年10月伊拉克总理马利基访问伊朗。两伊出现互相包容之势,形成共存、共损、共荣格局。

## 六、结语

自1921年伊拉克诞生后,两伊关系在民族主义因素的影响下,经历了“龃龉→对抗→冲突→缓和→回摆”的变迁过程,表明民族主义日趋理性,更多的服从于国家利益,更符合当今世界的发展潮流。虽然民族主义在手段和目标上具有双重“硬化”特征。但在符合民族主义所关注的国家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民族主义的内涵和形式并不是僵化的。两伊关系的改善就明显的反映出这一点。因此,国家可采取各种合适的途径和手段来满足民族国家的利益需求。在国家间的互动进程中,民族主义的自我观念、自我利益必须不断调节、变化与更新,以适应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当然,传统文化和历史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使得民族主义在国家利益方面的表现具有形式与内涵两方面的本质差别,造成民族国家面对同样的国际环境的反应不尽相同。这也是世界充满丰富性、多样性,从而使得世界不均衡发展并且有不同类型民族国家的内在原因。国家间的民族主义在处理国家利益方面是互动的,包括双边互动和多边互动。在频繁的互动中,民族国家间通过相互影响、相互学习、相互调解、相互妥协,逐渐塑造出共同观念与共同利益,进而消除彼此之间的分歧,真正实现和解。

当今世界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必然会对民族主义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制约,但是在可以预见的相当长的时期内,全球化并不能削弱民族主义,而是与其共存,并有可能进一步促进新的民族主义的发展。在新的形势下,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虽然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民族主义的作用并未减弱。时至今日,民族国家仍是最主要的国际行为主体,全球化过程中的发展仍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发展。只要民族国家存在,民族主义就不会消失,并将随全球化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其形式,丰富其内容,来适应自身存在

的需要。在全球化不断扩展、加深的历史大势下,区域性的“聚合型民族主义”和经济上的“积极的民族主义”及文化上的“普世性民族主义”<sup>[16]</sup>将会使民族主义更具建设性、理性化和普世性的特征。因此,在未来,民族主义仍将继续存在,并发挥不容小觑的作用。两伊应顺应形势发展,正视现实,适时地进行民族主义理念的更新与转变,消除彼此间的恩怨和分歧,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上进一步加强沟通与交往,践行合作共赢的理念。

## 参考文献:

- [1] Jan G Janmaat.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Education: The History of Ukraine in Soviet and Post-Soviet Schoolbooks [C] // Taras Kuzio and Paul D'Anieri. Dilemmas of State-ed Nation Building in Ukraine, Westport: Praeger 2002.
- [2] Smith Anthony. Emory and Modernity: Reflections on Ernest Gellner's Theory of Nationalism [J].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1996 2 (3).
- [3] 杨灏城, 朱克柔. 民族冲突和宗教争端——当代热点问题的历史探索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6.
- [4] Kayhan Barzegar. The New Iraqi Challenge to Iran [J]. The Iranian Hub 2004 (10).
- [5] Majid Khadduri. Socialist Iraq: A study in Iraqi politics since 1968 [M]. Washington, D. C: The Middle East Institute, 1978.
- [6] Day Alan J. Border and Territorial Disputes [M]. London: Longman, 1982.
- [7] 彭树智. 东方民族主义思潮 [M].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2.
- [8] 赵克仁. 试析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演变 [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 (4).
- [9] Milton J Esman, Itamar Rabinovich. Ethnicity, Pluralism and the State in the Middle East [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 [10] Allcock, John B. Border and Territorial Disputes [M]. Harlow, UK: Longman Group, 1992.
- [11] 黄前明. 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发展道路与中东地区的现代化——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为例 [J].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7 (6).
- [12] 刘月琴. 冷战后海湾地区国际关系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 [13] Javad Vaeidi. Exemplary War [J]. The Diplomatic Hamshahri (Farsi daily) 2003 (2).
- [14] 新华社. 伊朗前总统警告美国统治伊拉克伊朗将不再中立 [N]. 南方日报, 2003-05-10.
- [15] R. K. Ramazani. Ideology and Pragmatism in Iran's Foreign Policy [J].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2004 58 (4).
- [16] 刘中民. 关于冷战后世界民族主义的若干认识 [J]. 世界民族, 1999 (4).

责任编辑: 陈东霞